

毛泽东与中央党校

□ 孙国林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它的前身是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长征中被迫停止教学工作。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长征一结束，就在瓦窑堡复校。1937年2月，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进入快速发展期。1947年3月转往东北。它在延安办学长达11年，培养干部10余万人，书写了中共党史上辉煌的一页。

提议复校

1935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与张闻天等商议，中共中央党校在瓦窑堡龙公巷小学天主教堂复校。长征刚一结束即复校，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党校培养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当时决定：党校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成仿吾。教员有冯雪峰、马士良、朱子修等9人。第一期招生300余人，分3个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党校很关心，负责人经常来校作报告。1936年5月21日，周恩来来校作《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报告。6月，中央党校先后迁往保安、定边。8月8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应是一个标准。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群众的领袖。党校学员，要学习刘志丹，忠于人民，为老百姓做事。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党校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1937年2月，迁入延安。

为中央党校制定校训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党校的发展，不仅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讨论党校的工作，还多次亲自到校讲话，指导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

1941年底，彭真去见毛泽东，说：其他学校都有校训，而且鲁艺、陕北的校训，还是你们制定的。你也为咱们党校制定一个校训吧。毛泽东稍作沉思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教育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4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延安各系统整风及检查工作的指导分工，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8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的第二部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题为《党校的学习目的和方法》的演讲。他说：同志们大多

从前方回到党校学习，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不能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这次党校统一开6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毛泽东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索取东西，是为了剥削，与老百姓爱牛差不多。我们要对群众无限忠心，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从群众的反应，落不落泪可以看出来。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号召大家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的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1943年11月，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校师生参加，修建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彭真去请毛泽东为大礼堂题词，毛泽东高兴地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之后，这四个大字被加工刻在四块方石上，镶嵌在礼堂的正门上方。“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乃至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如今，这款题词，依然竖立在各级党校的门口。

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定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当时，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所以，在春季新一届学员开学时，毛泽东来校作报告。而且，后来中央领导人作指导整风运动的分工时，毛泽东负责抓的也是中央党校。用今天的话说，中央党校是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试验田”。

《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指出了整风的必要性。毛泽东说：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党还是有问题的，他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整风的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当时人们习惯把整风称作整顿“三风”。

接着，他对这“三风”对革命的危害，一一进行了剖析。

关于主观主义，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但是在这两种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剖析了教条主义生搬乱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

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主观主义是一种一切从主观出发的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主要表现是：只注重想象，不顾客观实际；只相信书本或者自己狭隘的经验，无视客观规律；只凭自身的主观意志，不听群众的意见；或者是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或者闭门造车，不做调查研究，等等。这种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对革命危害极大。后来，毛泽东生动地指出：“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关于宗派主义，报告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毛泽东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报告对党八股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后来，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报告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后，阐明了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强调：“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针，被党继承下来。

高度评价《逼上梁山》

毛泽东观看中央党校演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后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那封著名的信。

1943年5月4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该校的三部。其中一些专家、学者，熟悉历史，爱好平剧（即京剧）。他们懂得“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于是，在副校长彭真的支持下，便开始以《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为基础，创作为现实服务的新京剧的工作。

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的初稿，是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根据《水浒传》第6回至第10回的故事，于1943年9月至10月间写成的，共23场。大家觉得初稿不错，情节动人，适合演出，即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一批具有京剧修养的同志进行边排练、边讨论、边修改。修改后的《逼上梁山》，为3幕27场。《逼上梁山》剧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逐渐完善起来的。这个戏的主题是阶级压迫，逼着人民起来革命，反抗统治者。这是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中央党校的“大众艺术研究社”，经过对《逼上梁山》约半年的排练与修改，1月2日晚正式彩排，与观众见面。当时采用领导、行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人人可以对剧情、台词、表演、化装提出修改意见。彩排时，朱德、周恩来、彭真等都来观看，而且提出修改意见。1月9日晚，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李富春、凯丰、任弼时、谢觉哉等，来到中央大礼堂观看演出，最后鼓掌致谢。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的演出，当晚乘兴给剧作者杨绍萱、导演齐燕铭写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由于党校在京剧改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决定正在筹建中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划归中央党校管理。

（摘自2015年第4期《党史博采》）

周恩来的俭朴生活是众所周知的，穿衣穿鞋也不例外。

1965年7月5日，他出访归来途经新疆，就去石河子看望内地赴边疆的支边青年，下榻于石河子招待所。他的卫士和招待所服务员见到周恩来脱下的皮鞋里有个闪光点，就拿起鞋子仔细地瞧，原来是皮鞋穿久了，多次修补的鞋钉已在鞋内露出了磨亮的钉尖。经卫士同意，服务员很快给他把皮鞋修好了，并放进一双新鞋垫。周恩来醒来后，发现了这一切，但因离开的时间到了，已来不及找到那位修鞋的服务员向他表示感谢。就在周恩来离开房间走出招待所时，突然见到了他已认识的淮安老乡、当时也在石河子招待所餐厅当服务员的女青年李正兰，就连忙叫住她说：“小鬼，我的皮鞋坏了，不知哪位服务员帮我修好了，还放进了一双新鞋垫，请你这位小老乡帮我问一问是谁，表示我对他的感谢！”

□ 秦九凤

10年过后的1975年4月1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要来我国访问，并希望能见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此时住在医院的周恩来已经病重，双脚肿胀，那双经多次修补的皮鞋已穿不上脚。他身边工作人员只好按他脚浮肿后的尺寸，请鞋匠为他订做一双圆口布鞋。

会见完金日成后不久的一天，杨金铭师傅送东西到周恩来病房。周恩来自知再也不能穿他原来的皮鞋了，就拉住老杨的手说：“老杨，你跟我这么多年，吃了许多苦，我也没能很好照顾你。”说着，周恩来指着放在一侧的皮鞋，“现在，我这双鞋已经不穿了，你子女多，拿去给孩子们穿吧”。老杨强忍着泪水，精心地将这双皮鞋收藏起来。

1991年，杨金铭师傅也已故

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 李劲峰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工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厂长、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区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一次在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时，雷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4个指头，左眼晶体被炸破，几近失明。

1947年，吴运铎奉命去大连建立引信厂并担任厂长。在一次试验弹药爆炸力的时候发生意外，他被炸得浑身是伤。治疗期间，他阅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中得到鼓舞和激励。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疗。经过精心治疗，他的左眼重见光明。根据自己的成长、战斗经历，吴运铎写成传记《把一切献给

党》，后被译成7种文字，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吴运铎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他的名字传遍了祖国大地。

吴运铎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重要贡献。离休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和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担任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为教育事业、残疾人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他“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称号。1991年5月，吴运铎在北京逝世。

（摘自2019年10月14日《北京日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很多大咖聚集在北京，要从1000多首作品里选出一首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当时，从国歌歌词的征集启事发出到最后选定的时间是71天，最终当选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原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据史料记载，在遴选国歌的过程中，刚开始有一些人并不是很认同《义勇军进行曲》。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至少是歌词里的某些词语已经过时了。比如，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就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妥，因为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时间打败了“蒋匪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欣欣向荣的，怎么会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判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义勇军进行曲》这样成为国歌

□ 张志君

支持直接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和反对直接选用的这两部分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必修改歌词，“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面对逆境，大家很容易抱成一团，一起奋斗，共克困难；面对顺境，也就是形势一片大好时，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决定

了个体或组织、国家究竟能够走多远。

《义勇军进行曲》的脱颖而出，还因为它彰显了当时的遴选主体们对以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于全面抗战时期，是红极一时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著名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连荒山中的三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这句话足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不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详的，就连荒山农村的村夫牧童也会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

经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边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据说，这位在著名音乐剧《游艺船》里演唱《老人河》而一举成名的演唱家，能用英、中、俄、法等20多种语言演唱。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在纽约用英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灌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

《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歌词修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

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主办方邀请当时正在筹备建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会。按规定，会议开幕时，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决定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成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1978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即1978年版的《义勇军进行曲》。转眼到了1982年，一直被改来改去的国歌歌词又回到了原点，恢复了本来面目。同年，《义勇军进行曲》以全国

人大正式立法的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不是代国歌。

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就能够体会到居安思危的胸怀、境界，体会到对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更能感受到国歌对于中国人增强凝聚力的推动作用。国歌价值在于更好地发挥凝聚“想象共同体”的独特作用。什么是“想象共同体”？例如，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共同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凝聚“想象共同体”的每一分子，也就是每一分子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主观认同。

（摘自2019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

